

在中国人的节日系统里,清明节是比较独特的。首先,它是一个与传统农时节律“二十四节气”相吻合的节气,节日与节气的重叠在节俗史上并不多见,而清明节融合了历史上的寒食节、上巳节等节日内容,与农事节令关系密切,既是一个节气,又是一个节日。

清明时节雨纷纷。清光绪年间成书的《燕京岁时记》所引《岁时百问》云:“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节祭祖而明净,又是一个缅怀故人、追忆亲人、寄托哀思的日子,清明上坟扫墓的习俗源远流长,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云:“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生离死别处。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到南宋,浙江余杭诗人高翥(1170-1241)的《清明日对酒》更是将清明节上坟的情景描写得尤为具体:“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正在清明节祭祀的人们,只有各自伤心,没有相互交流。烧的纸灰,形同飞舞的蝴蝶,伤心的眼泪如同杜鹃啼血,然而天真无邪、尚不懂悲伤的孩子玩笑如旧。是啊,人活着就应该豁达,细细品味生活。清明上坟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人们清明上坟,扫墓祭祖,铲除杂草,放上供品,上香祷告。现在更多的人还会献上一束鲜花,以寄托对先人的怀念。

清明节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追忆和祭奠先人,固然是肃穆、哀伤的,但天地清明,春意正浓,雨水充沛,空气清洁,气温回升,自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也是人们踏青游玩、享受春天无穷乐趣的节日,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刻,逝者与生者,哀伤与欢乐,看似人世间的一个悖论,在清明节得到了充分的协调和安排。

偶而翻看旧照片,看到母亲年轻时玉兰花般的笑容,黑白照片有着浓浓的岁月感。我问母亲,什么时候照的?可真漂亮,您是三姐妹中长得最漂亮的。

母亲笑了,露出洁白的假牙,笑容苍老,头发花白,找不到一丝当年的影子。母亲在阳光下对着照片看了又看,说那时我们姐妹三人整天半真半假地吵架,跑了几里到城里照的。日子真快,岁月真是不饶人啊,母亲伤感地说,如今姐姐走了,妹妹也走了,只留下我了。

月色如水,我在紫藤花架下走着,走着,忽地想起我这十年,把键盘当作钢琴来弹奏。有一天,遇到从前的一位同事,问我这么多年去了哪里?他说话时,我望见他脸上的皱纹,以前他可是气宇轩昂。我有些伤感,我似乎望见一只叫岁月的虫子,每天不停地爬动。想起纳兰容若《虞美人》中的句子:“背灯和月就花阴,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这十年,我除了留下轻飘飘的文字,什么也没有了。

有时候,岁月并没有真的流走,而是换作另一种形式存在。正如席慕容说:我总觉得,生命本身应该有一种意义,我们绝不是白白来一场。

回老家,遇到儿时的伙伴小朵,如今她的女儿已亭亭玉立。依然记得小时候我们一起找蝉壳,扑蜻蜓,一起去草从里找一种能吃小紫果儿,冬天我们穿得像粽子,用雪来堆房子,画上窗户……岁月像一本书,在渐渐翻页中泛黄了。

在变幻的生命里,岁月,原来是最小的小偷,偷走了我们在乎的和不在乎的东西,青春,激情,爱情,亲情……等到想要去追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们根对不是岁月的对手。那么在流失着的岁月里,我们唯有努力,就像春天种下禾苗,秋天收割稻谷。

电影《岁月神偷》里,看着小弟一秒一秒地倒数着时间,就感受到了岁月的残忍……蓦然回首,那些转错的弯,那些流下的泪水,那些滴下的汗水,不论好坏,终究成就了现在的自己。有些事注定成为故事,有些人注定成为故人。

庆幸我们还有大把的时间,愿我们与岁月言和,和岁月温柔相待。

江南吴地在数十年前,清明上坟是与“清明远足”联系在一起的。远足踏青构成清明节的重要内容,到农村小道上散步,或者在金黄的油菜花丛中徜徉,也可以在河边的桃红柳绿下奔跑,更可以去弯曲的山路上攀登。祭奠扫墓、追思先贤、敬重祖先的活动也同时伴随清明节的大众性娱乐活动,如斗鸡、拔河、荡秋千、放风筝和蹴鞠等,两者结合形成了林林总总的清明节俗形式,这些节俗形式并不是源于官方的律令条文,而是来自芸芸众生自发的生活实践。因此,这些习俗比礼法所规范的传统要坚韧得多,也强大得多。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出自《论语》首篇《学而》,根据历代注解,这句话说的是对丧祭之礼的重视及其对民风民德的影响,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慎终追远的深厚感情,同时也反映出中国人豁达的生死观。孔子所主张的礼节不是刻板的教条,而是发自内心的至情至性,葬祭之礼,是人子行孝道的最后表现。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有把生与死等量齐观,将个体生命看作呈“抛物线”状的自然过程,对生和死都抱着顺应自然的态度。这种豁达的生死观在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以前就已经存在,如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庄子的“齐生死”等。许多坚定的唯物主义者面对死亡,说“去马克思恩那里报到”,也是一种淡定的态度。这种生死观派生出对生命的两种态度,一是顺应自然,“知足常乐”的生存观;二是“砍头不过风吹帽”,“视死如归”的死亡观。

从古至今,“入土为安”习俗顽强传承。土葬就会有坟墓,坟堆历经一年四季的风霜雨雪,难免会堆土蒙尘,难免会草木凋零,就像故去的亲人,越走越远。因此,在来年春暖花开、万物萌发之时,就有“扫墓”之举。扫墓、祭奠,是一种神圣的生命交流仪式,它年年轮回,代代传承,昭示着血脉的继承,使祖先与后代之间有了联系,构成了人们顽强生存和追求幸福的重要动力。中国文明几千年香火不绝,一脉绵延,当然与这种“不忘本”“不忘根”的民族特质有重要关系。

今年3月27日,是民族音乐家、教育家许光毅先生诞辰110周年的日子。余生也晚,未能有幸和许先生见面请益,但是通过他留世的文稿、著作、录音、音乐作品,及其哲嗣许国屏先生的回忆,我走近了这位终身致力于民族音乐学习、传授、发展的“琴台孺子牛”,并被 he 身上的三股劲所感动。

许光毅身上有一股学本领的钻劲。他9岁学拉二胡,第一把二胡是哥哥买给他的一把白木二胡。琴弦拉断了,没钱买新的,就接起来再拉。实在无法再接了,就把母亲扎头发的丝线当作弦线装到二胡上。丝线发不出声音,拉的时候只能凭着弓上的马鬃与丝线摩擦的感觉来练习,可见他当时生活的清苦和练琴的勤奋。

他19岁加入著名国乐团大同乐会,拜郑觐文为师学古琴。

1933年4月,在为芝加哥世博会录制的纪录片《国民大乐》中,许光毅担当二胡演奏。1938年,为参加“中国文化剧团”到美国募捐演出,他和剧团乘一艘美国小货船离沪,途经香港赴美。22天

的航行中,尽管遭遇了晕船、呕吐等苦头,他还是坚持和团友一起排练节目,保证了美国30多个城市演出的顺利进行,为民族增光。

上世纪40年代,许光毅在上海举办过两次“古琴二胡独奏音乐会”,一次

“琴台孺子牛”许光毅

苗青

是在西藏南路青年会大礼堂,另一次在南昌路47号的法文协会。他还和俄国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合作,在兰心大戏院同台演出,成就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已经年逾八十的许光毅,为了抢救古琴文化遗产,不分寒暑,学习研究古琴“打谱”。因患有眼疾,他就拿起放大镜,边弹边记边斟酌,进行艰苦的艺术劳动。靠着这股好学的不倦的钻劲,抢救下一百首古琴曲。许光毅身上有一股抓工作的韧劲。面对民族音乐在旧社会被诬为“叫化胡琴讨饭笛”“乞丐艺术”的侮辱,许光毅义愤填膺,立志改变窘境。他与人组建了“中国管弦乐团”“礼毅音乐研究室”,向亲戚借了二百元,在自己家

跑旧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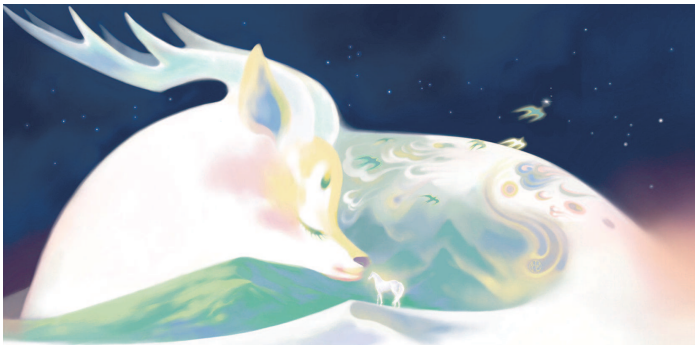
任溶溶

和许多旧书摊摊主成为朋友,他们后来进了上海书店,我们尚有往来。

如今我不跑旧书店了,一定还有好书,我去不了,可惜!

当年我最爱跑旧书店和旧书摊,收购来有些书,至今还算宝,如晚清小说。收购来的《海上述林》我还送给了一位新四军领导人。

春风沉醉的夜(插画)至尊饱



母亲心中有景致。我小时候,不懂事,也不可能了解,天天看到的是母亲的忙碌和操持,以及特有的微笑。长大后,母亲在我眼里也始终是克己内敛,洒脱而并不张扬的人。

父亲刚去世时,我担心母亲孤独寂寞,便与母亲商议请她到我家小住,母亲就是不同意。我只能改变方案,自己住到母亲家里,与她共克难关,并暗付在丁艰守孝期间,天天苦缠软磨,以软化母亲的坚定。

整整四十九天,我包揽了所有家务。一天早晨,我趁天气与母亲心情一样晴朗,意欲帮助母亲洗晒被褥。整理时,发现卧榻之侧有一个破旧的小盒子,便挪动了一下。母亲突然出现在旁,急急地抓起小盒子,捧在怀里,表情极其隆盛严肃。我正想询问,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之后,我脑中始终疑惑,不停自问:盒子里究竟是什么?是外祖父留下的大清邮票?小时

候,我好像听母亲说过,但是,集邮册早就不见了!对了,可能是外祖母传给母亲的金银珠宝?

有一天,我早下班赶回母亲家,“姆妈,我回来了”,我轻声呼唤,随之推开母亲卧室虚掩的房门。母亲扭头看到我,一怔,赶紧收拾散在床头柜上的物件,塞入那只破旧的小盒子,合上后,才露出微笑应答我。彼时,好奇和疑惑在我心里更是增强了几分。

就这样,我陪伴着母亲度过了父亲去世后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母亲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退休后,仍然担任原学院退休党支部的组织工作。母亲自己省吃俭用,对于社区公益建设却从不缩手,时常免费授课讲学。八十多岁时,母亲的党员组织关系转至居住所在街道,而她毫不倦怠,依然忙于公益,不亦乐乎!然而,毕竟年

事已高,有一次母亲不慎摔伤了。母亲住院后,院方让我整理她的衣物用品。母亲听闻后,神情审慎地叮嘱我要把她那只小盒子一同带来,并一再强调不能打开。当我找出那个小盒子时,犹豫和解密的心思在脑际摇摆。

最后,我还是忍不住探秘之

母亲的景致

王孝平

宝,盒子里藏着的,全是一些小本本和小纸片,细看,竟是一些党费缴纳收据,还有助学、扶贫、救灾的捐款凭据,以及表彰证书和旧时剪报。

我一张一张地看着,那些发黄脆的纸张,虽然有的字迹已褪色,有的边角磨损,但我眼前,仿佛正展现出一幕幕景致。那是母亲心中的景致,宽阔而柔美。有六十多年党龄的母亲,从来没有停下她的追求,却从来都没有

里建立“新文艺乐器社”,对民族乐器进行改革试验。就这样,他采取的团、室、社三结合形式,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还举办民族乐器展览,参加慈善演出等活动,竭尽所能地宣传推广民族音乐。

上海解放后,民族音乐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52年,他被陈毅市长任命为全国第一支专业民族乐队上海民族乐队的副队长(当时无队长),全身心地投入到乐队发展和培养新人的工作中去。

当时条件艰苦,市文化局特拨款五百元到老城隍庙买了一批民族乐器,用三轮车送到乐队里,许光毅把自己家里的乐器全部搬进了乐队。他带领同志们创作改编、整理了一些乐曲,在音乐会和招待外国贵宾的演出中获得了好评。他甘为人梯,先后培养出高健君、厉不害、肖白

编写上海民族音乐发展史,建立抢救古琴艺术遗产基金会和民族音乐博物馆。当他得知自己

从肺癌转为骨癌无法医治时,决然地对长子许国屏说:“你不要抢救我了,要抢救民族音乐。”这句话,激励着许国屏带着笛子走进山区、边区、牧区、贫困地区,行程20万里路,开展普及民族音乐的工作,被媒体称为“音乐长征”,很好地承扬了父亲弘扬民族音乐的衣钵。

2000年7月9日,许光毅在读完了自己写的《我爱民族音乐的一生》清样书稿后,再也没有开口说话。次日离开了人世。

许光毅投身民族音乐事业80年,从退休到去世的26年间,他还一直为保护民族音乐的丰富遗产而呼吁,为抢救民族音乐而努力,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琴音不止”。

2019年,新建成的闵行区博物馆开放了“中国民族乐器文化”常设展,展陈了200余件实物,呈现出民族乐器文化的璀璨多姿。如果许先生在天有灵,他应该会感到欣慰的。

半点声张,即使是在儿子面前,她也不肯宣扬。她不愿我打开盒子,许就是她从来内敛而不事张扬的性格使然。

回到医院,母亲捧着小盒子,问我:“是否打开过?”我看着母亲,母亲亦是看着我,温柔而坦然的目光。我被母亲心中的景致彻底感染了,小盒子里那些纸片上记录的人生,那些过程,对于母亲,是何等的享受?

我鼓起勇气怯怯地告诉母亲:“我打开过了!”母亲看了我许久,而后,轻声说:我想休息一会儿,好吗?

突觉如释重负,这就是我一如既往的母亲,不愿意展示自己的、内敛的、洒脱的母亲。我便也什么都没说,只点点头,踮着脚,轻轻走出了病房。

父亲的遗物中,我最重视的家庭史料。

责编:王瑜明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